

新民主主义 与新社会主义

王占阳 / 著

一种新社会主义的 理论研究和 历史研究

(修订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 与新社会主义

王占阳 / 著

一种新社会主义的 理论研究和 历史研究

(修订版)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理论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修订版）/ 王占阳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

ISBN 7-5004-4811-2

I. 新 II. 王… III. ①新民主主义-研究②社会主义-研究 IV. 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688 号

责任编辑 夏 雨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32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版序言

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曾经说过，“我在新社会主义原理方面的一些想法，仍然不够成熟，暂时还不便于拿出来”。现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和思考，我在新版中增写了七篇附录，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书初版纯理论部分为九万多字，这次在纯理论方面又写了十万多字，新增内容是比较多的。

本书新版的七篇附录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哲学，二是新社会主义经济原理。

我在本书初版中已经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基本命题，但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和阐述还是很初步的。本版附录一《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着力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人的世界，实际是一个价值世界。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价值世界。因此，社会主义理论的首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理论。但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弱点之一，也正是在于社会主义价值理论的发展不充分。我们之所以长期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这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治价值理论问题。因此，研究社会主义价值理论问题，也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哲学问题。社会主义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实际是有所区别的。相对来说，前者是小概念，后者则是大

概念。社会主义价值观不仅包括社会主义价值理论，而且还包括有更多的内容。事实上，有些社会主义者（即持有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士）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不是系统的价值理论，而只是一种比较模糊、比较情绪化和比较缺乏论证的价值观，是大体上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愿、社会意志范畴的东西。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这种层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存在，显然是普遍的、大量的，但这也是自然的、正常的。要求每一位普通的社会主义者（如一位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的普通居民）的脑子里都有一套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近情理的。但是，如果要求社会主义理论拥有自己的系统的政治哲学，并将整个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建立在这种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却是合情合理的。近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教训之一，实际也正是在这里。忽视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建构，确实是长期存在的大问题。西方社会主义虽然比较重视研究社会主义价值观，但也未能形成独立、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则更是长期地陷入了否认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理论重要性的理论误区，认为强调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理论的重要性就是所谓“唯心主义”。由于这种错误观念的误导，我国社会在基本价值观方面，长期存在着严重问题，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了，后果也更为严重了，因而也已迫切需要予以解决了。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重塑和普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显然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简单地重走一遍西方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理论自然成长的历史道路，而是着力构建明确、系统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从而使人们不是从我们所缺乏的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文化传统中，而是直接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中，迅速地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首先是派生性的社会主义，而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一切派生性社会发展赖以顺利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正是在于理性力量的充分发挥。^①

当然，我们也知道，构建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这其中的最大困难，就是长期难以发现和确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之所在，因而也就无法根据统一的最高价值标准，真正地构建起严整的社会主义政治哲学来。我注意到，对于这种困难，恩格斯实际早在 100 多年前，就已发现了。我在文中将恩格斯所发现的这个难题，命名为了“恩格斯难题”。而在某种意义上，本文所力求解决的，也正是这个“恩格斯难题”。

“恩格斯难题”，确实很难解决。但同恩格斯相比，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很大的优势，这就是人类 100 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从对这种实践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中终于领悟到，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实际就是“普遍幸福”。吴仁宝说“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也是以直面现实的深刻的理论直觉（这种理论直觉并不是专家学者所独有的），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②不言而喻，既然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Universal-Eudaimonism）^③，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哲学，自然也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政治哲学”。当然，现在距离形成比较完整系统的普遍幸福主义政治哲学，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本文所提出的实质上还只是一个普遍幸福主义政治哲学的论纲。本书的附录二

① 王占阳：《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研究》，《史学月刊》2004 年第 1 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人民”这个词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可变性，所以恐怕还是叫做“公民”更好些。

③ 西方虽有“幸福主义”这个词，却没有“普遍幸福主义”这个词。而现在，由于哲学翻译家田立年先生的帮助，我们也终于有了“Universal-Eudaimonism”这个新的英文单词了。

《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并不是社会平等》，也只是对于这个论纲的略微展开。但我感觉，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实际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书的后五篇附录，有些是讨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有些则是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但在实质上，却都是讨论新式社会主义经济原理的，因而这五篇文章，也可以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

我在本书的前三章中，已经初步地提出和阐述了我在新式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主要观点。我认为，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经济。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结合，是一种内在的结合。也就是说，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主要地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幸福主义的公平分配而实现的。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结合，同时又不是一种经济制度与一种经济因素的相结合，而是两种经济制度的结合。这两种经济制度的结合，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合，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与资本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直接私有制、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等等的相结合，因而这种结合，也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全面的结合。

应当说明，我的这种观点并不是直接从某种经济理论演绎而来的，而是基于“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少数人幸福主义”这两个最基本的理论观点而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独立思考中产生的。它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致性就在于，它也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而且也是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的。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则在于，它是以新式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为对象的，而前者则不是。

有读者曾向我直接反映，本书对于新社会主义现象的马克思

主义解读，使之从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解释力与理论生命力。我也想借此机会说明，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的主要学术资源之一。中国引进西学，引进得最系统的，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熟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主要优势，尽管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会使这种优势变为劣势。我们过去曾经只引进马克思主义，同时扫荡其他西学，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那当然也是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很可宝贵的学术资源，但要使之活起来，那也不容易。邓小平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我们绝不能再让它死过去。活的马克思主义与死的马克思主义，有天壤之别。活的马克思主义是宝贝，死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垃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能够积极有效地研究和阐述这一历史时代所特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也就是能够超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传统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我在本书前三章所着力建构的，也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

当然，从经济学的专业标准看，我在这三章中所阐述的，也只能说是一个初步的基本思路，而并不是已经构建了比较系统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基本框架。这种进一步的理论工作，实际主要地是在撰写本版的四篇附录^①时初步展开的。在这项研究中，由于我的基本思路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所以我只能是在借鉴和汲取各种有关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直面历史和现实的理论研究。但这项研究的

^① 本版关于经济学的五篇附录中，最后一篇是收录的早年作品。所以最近关于新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文章，并不包括这一篇。本序言以后提到“四篇附录”，均指这种情况。

主要特点，又并不在于提出了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因为，事实上，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早已在西方获得了长期发展，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也是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这项研究的主要特点，实际是在于在基本经济理论的层次上，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为对象，对于这种现代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展开了专门研究，并且初步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相应的基本经济理论。这种经济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在本书的前三章中已经初步地表现出来了，而在这四篇附录中因经济理论研究的逐步展开，而又进一步地扩大了。但是，这种差别并不是由别的什么造成的，而是首先由时代性质的深刻变化所造成的，其次也是由人类近百年来的理论发展、认识发展所造成的。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时代性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理论也应有相应的大变化。在与这种时代性质相适应的限度内，理论变化越大，马克思主义就越多，理论变化越小，则马克思主义就越少。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实际就在于它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区别，但同时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论和科学理论成果。^①当然，任何发展中的理论，都不是完善的理论。我在这四篇附录中提出的理论，自然也是这样。我的自我感觉，这种理论的雕琢、发展的余地，可能仍然是相当大的。我所提出的这些理论究竟如何，相信读者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而我也在准备着随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①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四节《并非余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

借此机会，我还想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谈三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经济学。离开了唯物史观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生产力决定论。马克思、恩格斯历来认为，没有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但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人类至今仍然未能创造出来。资本主义仍然普遍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如果至今仍然否认这一点，还在讲什么“垂死、腐朽、没落”，那就是连起码的求实精神都没有，或者是对世界现状至今仍然缺乏应有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严格地认为，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主张仅适用于以这种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中也包括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现在既没有这种生产力，也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此，面对现实，如果至今仍把“三大改造”以来的中国社会看作“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那就不仅是在与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而且更是在蓄意践踏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理想和学说，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中国既未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自然也就不能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经济学说指导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实践。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承认，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只有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

当然，对于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们来说，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实际也是很不容易的。由此，人们的认识和实践，

自然也是在曲折中发展的。^①在历史上，当列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他在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当他在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迅速转向新经济政策时，他则是又基本上回到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轨道上来了。但斯大林后来又背弃了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重新陷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误区。所谓斯大林模式，从形式上看，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在实质上却又是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的。我们过去盲目地跟着斯大林跑，又加上了自己的某些更落后的东西，这在实质上就是在浑然不觉之中早已把唯物史观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抛到了九霄云外，并为此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到邓小平理论出现，这种情况才开始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邓小平理论不仅从根本上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且更使之获得了极重要的发展。邓小平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和市场经济的著名论述，以及本书所发掘和发现的邓小平的深层经济思想，即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但是，主要是源于斯大林时期的新型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长期影响，至今仍在束缚着某些人士的头脑。他们也许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却并不重视、也未能真正理解唯物史观。他们也许熟读《资本论》，却又未能真正地理解作为《资本论》灵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因而也就未能真正地理解《资本论》之本身。他们至今仍在坚持的直接公有制占据多数地位的诉求，虽然也是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表述的，但在实质上却是没有任何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根据的。他们所谓的“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自然就要占多数”，实际是完全忘记了或者是根本就不愿意承认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作为共产主义

^① 有关这一点的详细分析，请见本书的第四章和以后各章。

第一阶段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未设想过的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抽掉了这种基本的客观前提，或者是抽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却又仍然坚称这种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那么，这不是对于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或者干脆就是在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玩笑，又是什么呢？！^①

笔者曾经两次通读过《马恩全集》，深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是根本不可能推导出这种完全违反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来的。深通唯物史观的邓小平借用这种过渡性的提法，实际也只是其借以推动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的正当策略，而并不是他的深层思想之所在。国务院去年关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三号文件，虽然备受某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责难，但却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现实经济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的好文件。因此，现在有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站出来指责这份马克思主义的好文件，实际只是证明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抽掉了唯物史观、抽掉现实生产力状况要求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绝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说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由此，他们所强调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实质上也不

^①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直接公有制不可能在保证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占多数，也不可能任何前提下长期稳定地占多数。但在现代生产力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又能广泛深入地实行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条件下，间接公有制也确实能够占多数的。因此，正如邓小平所说，到那时，我们就是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而并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我们应当深切地理解这一点，深切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动态内涵，从而切实避免重犯形式上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实质上却是消极保守落后的“左”倾错误。关于直接公有制、间接公有制问题，请参阅本书附录六等处的有关论述。

过是要坚持以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罢了。但是，这种“指导”已经让我们遭受了那么多的大灾大难，我们何以还要继续坚持下去?! 他们的这种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词句，却又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的做法，并不能使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感到满意，而只能是迫使其再次宣布：“我只知道一件事，这就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回答他们的责难，同时也是为了澄清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根本性的误解，我在本版中将自己第二次通读《马克思全集》后撰写的唯一一篇论文，也作为本书的一篇附录。这篇论文的题目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理论再认识》。

其次，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还应当充分地考虑到时代性质的深刻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是比较单纯的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劳资双方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到经济理论领域中，则就是作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在很大的程度上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的严重对立。

但是，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相比，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时代，实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既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也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向上发展的历史时代，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相互矛盾、相互斗争，更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人类所能实行和所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当然也并不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而只是、也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和正在继续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其中，就西方经济学来看，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同时也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规律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实际已经发生了重大质变。从总体上看，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实际已是主张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相结合、资方利益与劳方利益相兼顾的新型经济学了。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实质就在于，事实上，它既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又是主张发展普遍幸福主义经济的经济学；既是主张维护资方利益的经济学，又是主张维护劳方利益的经济学；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又是新社会主义经济学。因而，从总体上来看，它也就是研究和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经济学，就是既为雇主阶级利益服务又为雇员阶级利益服务的新型经济学，就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对立的新型经济学。西方人民现在之所以能够过上普遍富裕的生活，这种新型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实在是功不可没。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普遍幸福主义分配制度的过程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这种新型经济学本身就是深具新式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来说，实际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衡量一种经济学究竟是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学的根本标准，已经不是在于它是否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而是在于它是否主张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马克思生活在劳资双方严重对抗的资本主义时代，所以他未能提出和采用这种标准，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现在生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世界历史时代，则已应当采用这种标准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仍然坚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极对立的传统观念，仍然坚持以是否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作为衡量标

准，因而也就仍将西方现代经济学继续定性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的思想就太脱离实际、太落伍了，也太脱离人民了。譬如，如果我们将“福利经济学”等主张和研究照顾人民经济利益的西方经济学也叫做“资产阶级经济学”，那将是非常荒谬的。如果我们现在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或者是主张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压缩和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那就是既不符合中国人民、西方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的，因而也就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经济学”、“穷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代发展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跟着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不与时俱进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是没有竞争力的“马克思主义”。

应当看到，作为事实上主张和切实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型经济学，作为事实上深具新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力，这在实质上是符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的客观需要的，是符合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发展新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的，也是符合现代文明时代所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等于我们就不再需要和不再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了。这是因为，我们还看到，导致这种替代现象发生的首要原因，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严重薄弱，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未能及时有效地实现适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的根本转变，因而也就未能较好地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新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需要。

所以，我们说，现在的问题实际并不在于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发展成为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现代文明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能否发展成为真正富有时代性、前沿性和竞争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而是仍然说着那些陈旧过时、不切实际的老话、空话、套话，从而把本来应当是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了死气沉沉的老古董，把本来是极富理论魅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了苍白无力的理论说教，把本来应当是历史前进动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变成了改革发展的桎梏的话，那么，人们普遍地抛弃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否定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并普遍地转向主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转向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新社会主义，也就不能不成为了一种次优性的历史必要、历史选择与历史必然。

毫无疑问，面对这种现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绝不当消极颓丧、怨天尤人，更不当试图以政治的强制力去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应当首先扪心自问：为什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力，而我们自己的文章却没有多少人愿相信呢？显然，问题并不是出在马克思主义身上，也主要地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正是出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所以，我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现在最应当做的，就是要全面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价值取向，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面对现实和承认现实，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遵循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坚持、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汲取西方现代经济学在新社会主义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成果，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解放心态，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发展潜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钻进书斋去和走进现实中，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展开充分自由的学术讨论……最终，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从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两极对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关于新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大飞跃。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重新获得巨大的理论力量，我们就能依靠这种理论力量去自然而然地和卓有成效地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导地位，特别是我们就能由此而卓有成效地确立首先由邓小平开始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

再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变化来看，同样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总趋势和中国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总趋势的推动下，从邓小平理论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已开始走上了主张和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走上了主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精神实质，实际就是主张广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公平分配、共同富裕相结合，就是主张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与实行普遍幸福主义的国家调控相结合，就是主张适当地拉开收入差距与适当地缩小收入差距相结合，就是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就是主张重新实行公私兼顾、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的立国之策，因而也就是主张走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我们还高兴地注意到，现在的中央路线，也正是邓小平所主张的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而且是在实践中发展了的新社会主义路线。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一手狠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一手狠抓公平分配，而这也正是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现在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尤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各种合理的私有制经济（这其中当然并不包括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腐败经济、黑社会经济等不合理、不合法的私有制经济）广